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 第三配置思想研究

严清华等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 第三配置思想研究

严清华等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第三配置思想研究 / 严清华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丛书 / 颜鹏飞、
伍新木主编)

ISBN 7 - 5058 - 5486 - 0

I. 马... II. 严... I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研究 IV. F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256 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丛书

顾 问：陶德麟 顾海良

主 编：颜鹏飞 伍新木

编委会：颜鹏飞 伍新木 严清华 王元璋
曾国安 张秀生 石 莹 吴传清
乔洪武 邱力生

总 序

本丛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

—

马克思主义“幽灵”和社会主义“幽灵”在世界各地游荡，已成为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的时代特征。世界性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追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崇尚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原创性和理论张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和本土化。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虚拟”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凡此种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朝鲜式社会主义”、追求“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越南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的共产主义，不一而足。

国外许多著名学者——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 J. H. 哈贝马斯、A. 吉登斯、E. 拉克劳、F. 詹姆逊、G. 拉比卡、J. E. 罗默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我仍看重马克思，或许已不再时髦”、“无怨无悔地拥抱后马克思主义”。法国学者 J. 德里达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因此，“不

➡ 1 ◀

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马克思的幽灵》，1993年）。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马克思列入与亚当·斯密、梅纳德·凯恩斯齐名的世界最伟大的三个经济学家行列，而《资本论》被视为三大经济学《圣经》之一。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和莱斯特·瑟罗指出：“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更确切地说，俯瞰整个社会学、哲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的思想史，马克思都处于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确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经济学的。就如同柏拉图改变哲学思想的景观或弗洛伊德改变心理学的走向一样”（《经济学的秘密》，2001年）。

兹以亲身体会二三事作证。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1999年由中欧—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在伦敦都市大学搞合作研究，我得以拜谒马克思墓地。这是一个天气阴霾的典型的伦敦之晨，一位来自美国的大学生左顾右盼，然后迅捷地从书包中掏出相机，要我帮忙在马克思墓前给他留个影。这件事是促成我们攀谈的契机。他的相机是偷偷带进来的，因为海格特公墓守门人规定带照相机要缴纳5英镑。他是利用打工积攒起来的钱来英国旅游，参观他仰慕已久的马克思墓是其中重要一站。我于是热心地给这位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友”介绍了马克思在英国的几个重要活动遗址，伦敦市政当局并且还嵌挂了显眼的蓝色介绍牌，其中包括与《资本论》写作密切相关的第恩街28号（1850~1857年）和梅特兰花园路多所旧居，以及与《共产党宣言》直接相关的索荷区红狮子啤酒馆。此外，大不列颠博物馆不可不去，但随着全部藏书迁往大英图书馆新址，马克思的足迹已不复辨认。原大阅览室只有纪念牌为证：“这间阅览室及其相关建筑物为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和精神源泉。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最早根植于这间阅览室。在长达30年的漫长岁月中，卡尔·马克思几乎每天来。1850年6月，马克思最先被旧的阅览室接待；并从1857年起从事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数项计划的研究。他很有可能使用的是离他所需参考书不远处的L. N. O. P几排座位。”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参加1998年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举办的《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研讨会。邀请方之所以发来会议请柬，缘起于我利用在特里尔大学当访问学者之便，向他们赠送《资本论第一稿研究》一书之故。新华社波恩分社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也到了会场。而西方学者深谙马克思著

作版本学，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在 1991 年利用中美经济学教育和交流委员会（CEERC）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资助，赴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当年活动最为频繁的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和学术交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收集第一手资料。作为一种破例，密执安大学慷慨提供了专项资助。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第一届大会论文集等珍贵文献资料，正是在密执安大学亚洲图书馆寻到的。尤应提及的是，年事已高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老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成了年轻一代美国人接触和认识马克思的启蒙教材——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用老式打印机敲打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为笔者提供了有关资料和研究思路。拙著《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问世，首先应该感谢这些素昧平生的马克思的追随者。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深信：人所皆知的英国著名的 BBC 广播电台评选千年世纪伟人而马克思拔得头筹这件事情，具有纪念碑式的重大意义。

二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三大理论贡献和“发现”作了最为权威的“盖棺论定”：

第一，“发现”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

马克思深刻阐述了“社会有机体制”、“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辩证法运动。他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并对其发展规律有两处经典性理论总结。他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资本论》第一稿 1857～1858 年）这段经典论述，批判了唯心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的社会机体发展观，从而把社会机体看成是包括各种要素、器官、前提或设定——部分来源于

从中脱胎而出的旧社会的机体（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残片”和“痕迹”）或来源于其他社会机体（如异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结构）——在內的开放型的对立统一体，它阐明了社会机体从低级向高级（“总体”）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体现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从而是这两大过程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

另一处表述见之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一书。马克思着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对这一规律作了人们熟知的经典式的表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学术界大多把这段论述视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部核心内容和惟一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误解。较之前表述，马克思在这里侧重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性和创造性。这与既定时代以及无产阶级政党赋予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即为工人阶级锻造批判和推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理论利器——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机体发展规律。应把上述两段经典表述以及散见于多处的相关论述综合加以理解。毋庸置疑，马克思社会机体发展规律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三四百年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市场经济运作和调节机制的理论和政策，以及通过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为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

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规律也是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探索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

恩格斯在晚年提出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这是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他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那封著名的信件中，提出了这一理论。这封信件的写作背景是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了解“主要原理”而浅尝辄止，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尽快地构成体系而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社会发展“合力”理论的主要规定性：

（1）整个世界、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和“结果”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

（2）“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3）“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

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绝不应当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4）这位辩证法大师以关于社会历史运动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的合力的思想为指导，还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 GDP 图腾化、情结化现象、经济建设“一条腿”长和社会建设“一条腿”短，以及抓硬实力硬与抓软实力软等等问题表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可持续发展。必须构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型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造就一种强大的“合力”即和谐力。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在现阶段矛盾凸显期（尤其在一个国家处于从人均 GDP 大约 1000~3000 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恩格斯关于以“合力”为标志的社会新发展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积毕生之精力潜心研究、但尚未全部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马克思把这一结构视为“德国民族的骄傲”）和四卷《资本论》。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的“续篇”。而《资本论》（作为“六册计划”的首册《资本》篇）也是其基础或“精髓”部分，并自成一个基础性体系——《资本论》第 1 卷是马克思撰写出版，而第 2~3 卷草稿的整理和出版是由恩格斯花了 11 年才完成的，并由考茨基整理出版《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即《资本论》第 4 卷——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以及这一社会经济形态走向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实质和目的。无产阶级哲学及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哲学又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又为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奠定了基石。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根据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而剩余价值论又是基石的基石（列宁：《卡尔·马克思》，1913年）。毋庸置疑，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第三是方法论，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恩格斯称之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这是马克思第三大研究成果和理论贡献：“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

“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判和扬弃。

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关于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

（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辩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内学界出现经济学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例如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学者赞成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一言以蔽之，体系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鉴于用范式理论完全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在理论界已成一种时髦风气，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而是提倡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框架。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与西方范式理论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法论和优劣的区别主要在于：

（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

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2) 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但是，以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因此，总体思路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其次是“发展马克思”。该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是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三

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对立统一物。这种相对性的含义在于：首先，它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制约、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以及新生事物赖以产生的已有的思想材料和物质条件的制约。“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其次，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变迁而发展，它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其基本原理不是绝对真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并且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丰富、完善或扬弃自身。这是真理相对性的题中必有之义。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地逼近绝对真理，或者说它又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主要

体现在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经过实践检验的一般原理中。

我们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论者。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就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但是,前提必须是基本原理赖以成立的历史的物质的条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要倡导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的本土化或地域化。因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72年;恩格斯:《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

学术界出现一种“指导思想转型论”或“指导思想二元化论”,即马克思并无关于未来新社会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捉襟见肘,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从马克思经济学说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法律主张,或者至少两种指导思想共存。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重大问题。这种看法,人为地堵塞了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生命力或理论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根同源同脉同祖,薪火相传,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两者关系既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种渊源和继承的关系。从整体(总和)和方法论(发展观)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从中不得出肯定的答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活水和理论基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1) 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这种从属型和创造型相结合的新发展观,为洞察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商品经济思想,以及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辩证发展观。

包含从属型发展观在内的广义唯物主义发展观告诉我们:我们不应拒绝而且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注重吸收、扬弃、改造和同化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学派的一切积极的理论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西方兼容理论或市场社会主义。

国际上流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经历了六代和三大发展阶段,即萌芽阶段(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逐步形成时期(20世纪20~50年代)以及理论定型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60年代至今)。第一代兼容论者可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D. Belkin 语)的创始人J. S. 穆勒(1806~1873年)。而贯穿其

中一条重要主线是市场经济与各种所有制是否存在着的内在的统一性和兼容性亦即两者能否结合、兼容、磨合和亲和，涉及资源配置形式与所有制的兼容，亦即“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的亲和关系”问题（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2003年）。国外学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兼容性的问题上曾展开了多次大论战。他们虽然善于把资源配置的两大主要形式即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他们甚至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如美国学者施韦卡特还认为中国正在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试验”（《反对资本主义》，1992年），这是需要着重澄清的一种误解。尽管这一理论有许多缺陷和弊端，但它的积极意义，是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并且提出许多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这些无疑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补充性来源。

（2）辩证的新世界历史观：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总过程，必须受普遍规律——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全球化趋势——的制约，此即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普遍规律）与多样性（特殊规律）的对立统一。它为创立力图与世界市场或全球化经济相联系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关于囊括两种不同演进路径的经济理论体系。不能把马克思理论体系片面化和凝固化。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方法论或发展观上加以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研究对象不同因而呈现两大演进路线。前期以英国为典型，主要创建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即阐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市场经济学说。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或主要路径。马克思一生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应该理直气壮地强调指出：这些著作中对社会化生产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以及未来新社会经济特性的阐述，无疑构成了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因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

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与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就是通过深入学习和领会《资本论》及其相关著述的基本理论，进行“剥离”、“借鉴”和“嫁接”——剥离资本外壳（社会形式），借鉴有关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一般的内核（物质内容），再把它有条件地嫁接到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新的社会形式）中去——并最终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在后期主要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绽露了关于在特定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思想萌芽，呈现了另一条演进路径和理论轨迹，由此形成的另一子体系即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其中包括世界历史及世界市场理论、社会经济形态三阶段论、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理论、原始氏族和农村公社理论，等等。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以只具有落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历史起点的，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同世界市场相联系，吸收人类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他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 + 世界市场联系论 + 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阶段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尽管它未被19世纪末期的俄国的实践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

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有两条演进路径和模式：一条是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特征是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志的产品经济形态取代商品经济形态；另一条演进路线和模式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利用商业机构，亦即利用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笔记，对俄国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后者脱离生产力，脱离世界市场，脱离市场关系，空谈俄国农村公社社会主义新模式。因此，不能“肢解马克思”，不能人为地堵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和生命力。尽管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未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来源。

（4）关于两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存的经济学说。一是以生产关系为划

分标准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由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而允许出现“跨越”现象；二是以生产力和交往为划分标准的三经济形态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和相应的人的发展三阶段论，它们则不允许出现这种历史的“错位”。两种理论应该相互叠加，相辅相成。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 + 世界市场联系论 + 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是一个典范，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其启迪意义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落后国家，应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来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列宁晚年关于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以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来源。列宁晚年明确提出关于过渡时期必须重视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贸易或商业作用的思想，抛弃了排斥市场、货币、贸易或商业买卖的产品交换模式。他首次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在前苏共决议中明确采用“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的提法。列宁强调国营企业包括国营大托拉斯等联合组织，应普遍推行以经济核算制、考虑市场销售为标志的商业化原则或商业精神。并号召全党要学会经商，批判了那种所谓“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宣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7年的实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在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已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因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重要理论基石。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是“舶来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创新及其经验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性来源；马克思主义及其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基础性来源，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政策和经验材料，为我们提供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则构成其补充性来源。

伍新木教授和我主持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研究》和《当代马克思主